

吉田茂

外交思想

徐思伟 著

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前言

一、本课题研究现状及其意义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即以自由主义者、亲英美派职业外交家著称。从28岁到60岁,前后历时32年(1906.9~1938.9),官至外务次官、驻英大使,长期活跃于外交第一线,经历了近代日本对英美协调主义外交路线的确立、危机等重要时期。二战结束后,先后出任东久迩、币原两内阁的外相,继而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从67岁到76岁,前后历时七年零两个月(1945.9~1954.12),作为占领期乃至复兴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代理人,在日本战败改组和重建时期,奠定了日本战后政治外交的基本格局。吉田外交、吉田外交思想由此成为日本外交史专有名词。关于吉田其人及其外交的评价问题,历来纷杂不一。在日本国内,或称吉田为“签订辱国条约的保皇派”^①,或称吉田外交为“战败国外交的成功典范”^②,观点之差,相去千里。

笔者认为,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外交及其思想的主流,还有助于分析21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思想走向。目前,吉田研究领域不足乃至错讹之处颇多,特别是吉田外交思想研究尚为空白。

① 日本现代评论社编:《昭和宰相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2页。

② 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东京中央公论社1968年版。

笔者鉴于三种因素考虑而选择该课题为研究课题——

首先，从战后日本外交史的轨迹来看，吉田外交思想代表并反映了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外交及其思想的主流。

日本是亚洲国家，但近代以来却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近代的日英同盟，到现代的日美同盟，概莫例外；相反地，对亚洲国家的关系反被置于对英美关系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国际关系史上的特殊现象。这种现象只能从日本外交史自身规律上得以说明。在世界外交史上，与占领者结盟的被占领国家，除日本之外并无他例；结盟之后又能够维持半个世纪有余的独立国家，除日本之外也并无他例。战后日本外交这种创意，有其深刻的外交思想史上的渊源。吉田外交之所以被认为奠定了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格局，就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近代日本对英美协调主义传统思想，从而不仅成为占领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代表，还是复兴期日本外交的主要代表，甚至由他培养的“吉田学校”几代国家领导人也维护了他确立的对美结盟等外交思想。

占领期作为日本历史一专有名词，意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下的盟国对日占领时期。以占领期为例来看，战后日本外交与占领期日本外交密不可分，占领期日本外交又与吉田外交密不可分。占领期是吉田外交思想产生、发展到完善定型的时期，既反映了吉田外交思想这种总体过程的时间断限的三阶段特点，又反映出他在继承前人、自身思考及实践检验发展的三层次特点，也反映了不同时期对盟国集团内部的美英圈、苏联圈、亚洲圈不同政策的三方面特点。因此，占领期成为战后吉田外交思想形成的主体时期，也是吉田研究的重点时期。该时期，日美外交的对应过程，充分反映出日本在占领初期即使美国制裁也要对美协调，占领中期即使美国尚未彻底放弃制裁也要对美结盟，占领后期乃至占领结束后无论怎么强调自主也要维护对美结盟的基本特征。战后日本外交起步于被占领时期，外交总体方向的确定也

是在占领期主要由吉田外交完成的，其后外交政策历经多变，但基本方向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其次，从分析 21 世纪日本外交及其思想走向来看，吉田外交思想也仍未失其对日本外交取向的主导、制约作用。

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外交等国家主权从属于同盟国集团、特别是美国的占领权力；占领中后期，旋即又被冷战风云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吉田茂执政时代，正是 20 世纪 40 年代后半期到 50 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战后重建的日本，面临经济复兴、国家独立、保障安全以及重返国际舞台等四大课题。时至今日，占领时代早已结束，冷战格局基本崩溃，两大阵营基本消失，然而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仍然存在，日俄关系仍然持续于战时日苏关系状态。相对于西半球而言，日本是亚太地区冷战阴影残而未消的所在。世纪之交，国际关系分化组合愈演愈烈，亚太地区政治格局婆婆迷离。处于诸多问题中的日本不能不做出重大抉择，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都将发生深刻变化。那么，对于日本外交的走向如何判断？对于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何分析？日美同盟前景如何？日俄媾和何时告结？如此种种，都需要对成为战后日本外交指导思想吉田外交思想加以重新认识。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在确定吉田外交思想研究课题的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一是有种观点认为，日本外交从近代以来就没有什么规律性，有的只是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下的随机应变、武力冒险性，而缺乏长期稳定性、基础性、方向性。学者入江昭 1966 年便提出“无思想的日本外交”之论，认为“日本外交缺乏一般性的抽象的思想，这乃是贯穿整个近代日本史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明治初期以后的近代日本，外交上体现出来的只是政府的现实主义和民间的理想主义相互对立

的类型^①。二是有种观点认为，由于国际政治中的冷战结束，日美同盟不久将趋解体。三是以乔治·弗里德曼等著《下一次美日战争》为代表，认为日美之间不仅同盟解体甚至将发生战争。这些，都给关心日本学的人们，特别是日本问题研究者们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和挑战。

笔者认为，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没有什么规律可言，那么，对吉田在《十年回忆》一书关于日本外交的总结又当如何认识？如果日美同盟难以为继，甚至下个世纪会爆发日美战争，那么，仅仅以冷战体制结束、日美之间矛盾来作论据是否恰当？对于来自日美两国外的他国对该同盟延续的影响怎么看待？显然，上述三种观点有待重新认识。

1994年11月，笔者有幸参加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博士生访日团，在早稻田大学学生交流会上，做了以“战后吉田茂外交思想”为题的发言，曾提出关于吉田外交思想影响的长期性与日美同盟延续的长期性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其后，笔者循此思路，于1995年秋写了《占领政策的转变与日本外交传统的复归——吉田·芦田外交再认识》一文，发表于1996年第2期《外国问题研究》季刊上。正是在此过程中的同年4月中旬，日美两国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从而完成了1960年修改过的日美安保条约延续至21世纪的再定位的使命。显然，仅用冷战思维是解释不了冷战结束后日美同盟的再延伸问题的，日美同盟作为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漫长的同盟现象，也证明日本外交不能说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最后，从吉田外交研究现状来看，不足之处颇多。

吉田外交研究，指吉田外交的实践研究及其思想研究两个方面。目前，国外学者在吉田外交思想研究上尚存空白，在吉田外

^① 入江昭：《日本的外交》，东京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27～29页。

交实践研究上,专著并不少见。诸如:

小岛正固、竹内雄:《吉田内阁》,佐藤印刷所,1954年。

今日出海:《吉田茂》,讲谈社,1967年。

加濑俊一:《吉田茂遗言》,读卖新闻社,1967年。

高坂正尧:《宰相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68年。

田田官太郎:《吉田鸠山时代》,图书出版社,1976年。

猪木正道:《评传吉田茂》,读卖新闻社,1978、1980、1981年。

约翰·道沃:《吉田茂及其时代》,TBS·ブリタニカ公司,1981年。

高坂正尧:《吉田茂·背景和遗产》,TBS·ブリタニカ公司,1982年。

户川猪佐武:《吉田茂与复兴之选择》,讲谈社,1982年。

大岳秀夫:《阿登纳与吉田茂》,中央公论社,1986年。

村川一郎:《杜勒斯与吉田茂》,国书刊行会,1991年。

吉田茂纪念事业财团:《吉田茂其人》,中央公论社,1991年。

寺林峻:《怒涛之人吉田茂传》,讲谈社,1991年。

大冢高正:《外交与日本国宪法——吉田茂研究》,文真堂,1992年。

理查德·费恩:《麦克阿瑟与吉田茂》,同文书院,1993年。

三浦阳一:《吉田茂与旧金山媾和》,大月书店,1996年。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的吉田研究,在原始资料的使用上普遍存在未予重视的问题。以1978、1980、1981年分卷出版的《评传吉田茂》为例,该书以吉田战前为对象的上、中两卷,大量使用了英国原始档案,但这只是对战前吉田的评传部分,至于下卷关于战后吉田评传部分,则明显存在未能使用原始档案文件所产生的多为常识性的论述,同上、中两卷比较逊色很多;而

且,这种因素也导致该书将战前部分形诸两卷难免头重脚轻之嫌,因为吉田执政及其外交本是战后产物,将战后部分简为一卷在结构比例上有失妥当。如果认为该书写作时原始档案尚未完全解密的话,那么,1992年出版的《外交与日本国宪法——吉田茂研究》一书,就不存在这个原始档案解密限制的问题了。因为,笔者看到的占领期日本外务省外交文书缩微胶卷中,既有1976、1978年所制胶卷,也有1982年所制胶卷。然而,《外交与日本国宪法——吉田茂研究》这部目前笔者看到的关于吉田外交研究的首部专著中,在原始资料的使用上却令人失望。该书使用原始资料仅有两处,一是引用永井宪一等编《资料日本国宪法》,二是引用第90届帝国议会众议院议事录^①,在资料使用上与其他吉田研究书无大区别,这也决定了该书仅就宪法而论宪法,未将它放到吉田整体性外交政策中展开。

在我国,关于吉田茂及其内阁外交政策问题,学界发表的以日本史、战后日本史、日本外交史等为题的相关论著中均有专述。但至今尚未看到吉田研究的专著出现,有关吉田研究的论文虽有十余篇,但多未涉及吉田外交及其思想问题。而且,我国史学界的吉田研究,不仅存在尚未使用原始资料的不足,有的甚至史实不确,观点亦值得商榷。例如,关于占领期吉田外交媾和及安保问题,有的认为“吉田从他一贯的亲美反共立场出发,一开始就想同美国媾和而不想同中、苏媾和”,在安保政策上一开始就反对依靠盟国论等等^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占领初期的吉田外交,确立的恰恰是对盟国全面媾和及媾和后依靠盟国集团保障安全的政策。

① 大冢高正:《外交与日本国宪法——吉田茂研究》,东京文真堂1992年版,第194页注6、第197页注8。

② 冯昭奎主编:《战后日本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0页。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①就外交史研究而言，“义”即是指以外交史史实或实践研究为基础，涵盖外交史理论及哲学范畴的外交思想。基于这一理解，笔者在本书中便以战后复兴期吉田外交过程为重点，对战后吉田外交思想加以考察，具体围绕吉田茂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吉田茂外交思想与政治思想及经济思想、吉田茂外交思想与日本外交传统思想、战时吉田茂的反战活动与外交抉择、吉田茂与日美同盟、日美同盟的性质与意义、日美同盟与日本外交传统思想、日美同盟与战后日本外交走向、战前及占领期吉田茂与币原喜重郎、战后复兴期吉田茂与鸠山一郎（芦田均、重光葵）、吉田茂与“吉田学校”等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为避免原始资料及基础研究的局限，笔者以解读日本外务省文书课所制关于占领期日本外交原始档案的缩微胶卷为据，同时进行该课题的基础研究。笔者试图以吉田对日本近代外交传统路线的继承为立论基点，从其战前外交观与战后外交思想的一脉相承角度出发，将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外交诸特征，同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相结合，进一步揭示吉田外交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影响，分析战后日本外交思想及方针政策的历史由来，重新认识吉田外交思想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主导地位和指导意义，说明吉田研究与日本外交走向分析的关系所在。

二、本书基本结构和主要观点

吉田茂外交思想，主要是指战后吉田外交的指导思想，它具有两方面基本属性：

一方面，吉田外交、吉田外交思想是战后的产物。吉田茂在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9页。

战前与战后的政治地位及作用迥然不同。战前的吉田茂，只是外交政策的实践者，而非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即便在外务次官时代，也是在田中外交、币原外交下发挥作用和影响，没有外交决策权，无权决定外交政策的总体规划和调整。而战后的吉田茂，处于日本的执政、主导地位，既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外交政策的实践者。因此，严格意义上讲，不存在主体性质上的战前吉田外交或战前吉田外交思想之说，只能谈及战前吉田外交实践与外交思考。贯以“战后”修饰语，意在说明外交与外交思想本身，是处于执政或主导地位的政治家、外交家的外交与外交思想的本质属性。

另一方面，吉田外交虽然是在战后产生的，但吉田外交思想并不是在战后一下子就有的。思想本身具有特殊性，吉田的外交思考、外交思想，具有从战前到战后一脉相承之特征。对吉田外交思想贯以“战后”修饰语，并非将吉田外交思想本身割裂为战前、战后两大阶段，而是突出战后日本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与占领期日本外交的特殊性质相互作用的客体前提，以说明其具有来自周围成员和团体影响的群体性、集成性特征，说明吉田在战前外交实践与思考基础上的继承性、连续性特征，等等。总之，吉田外交与战后吉田外交两个概念并不矛盾，而是等同的。

本书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述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

序章 近代日本外交传统

笔者认为，日本自近代以来就形成了贯彻至今的日本特色的外交思想——“与强者为伍”的结盟主义；其中，通过对英美协调乃至结盟实现亚洲地区大国及国际大国目标，则成为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传统思想。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相当长时期内，日本近代外交是奉行对英美为主的国际协调主义为

传统思想,目的在于以英美为主要对象协调对华政策,通过对英美协调乃至对英结盟方式,以达到对西方修改条约,对亚洲实施武力外交,向亚洲大陆扩张,建立近代日本国家的目标。

对英美协调主义传统思想及亚洲门罗主义思想,构成了近代日本外交思想史上的两条基本路线。20世纪3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恶化及日美矛盾激化,日本为了彻底实现独霸亚洲、排除英美势力的亚洲门罗主义目标,不惜摒弃传统的对英美协调主义思想,转而与德意法西斯国家协调乃至结盟,进而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对英美协调主义传统路线最终让位于亚洲门罗主义路线。

1906年到1945年,一直活跃于近代日本政治外交舞台的吉田茂,接受并继承了对英美为主的国际协调主义传统思想,成为战前、战时日本“稳健派”的中坚乃至核心力量。战争末期,以吉田为代表的稳健派,鉴于日本因外交决策失误而导致对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必败困局,遂进行反战活动及外交抉择,最后以回归到20年代对英美为主的国际协调主义方式,重点对美英方面进行停战交涉,并进而在被占领期确立对美英协调乃至对美结盟政策,日本外交史随之由近代转入现代。

吉田茂继承对英美协调主义传统思想的主要表现是:

20年代政党政治时期,吉田相继出任田中内阁、若槻内阁的外务次官,是田中外交、币原外交的主要参与者。田中外交时期的吉田外务次官,支持对华武力外交与对美英协调外交相结合的外交思想;币原外交时期的吉田外务次官,支持华盛顿体制为标志的通过对美英协调以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的外交思想。

30年代日中战争前期,吉田相继出任驻意、驻英大使。在驻意大使任内,极力主张通过对英美协调以维护日本在华侵略权益,支持以驻英大使松平恒雄为代表的外交主张,即同英美积极协调,使其承认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国联托管权”,反对向华盛

顿体制挑战而导致与英美的决裂，反对退出国联而导致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困境。在驻英大使任内，积极展开与英国、美国的交涉，主张通过对英美协调维护日本在华侵略权益，反对向华盛顿体制挑战而导致与英美的决裂。

40年代太平洋战争时期，在野政治家吉田起初极力反对对美英开战。战争爆发后，他一方面联合币原喜重郎等向天皇近臣木户幸一、近卫文磨等进行外交教育，同时集结稳健派力量决心推翻东条内阁，尽早实现停战媾和。最后关于停战外交方向上，批判政府的对苏媾和外交取向，主张尽早展开对美英的媾和外交。

第一章 占领初期的吉田外交

占领初期，吉田茂历任东久迩、币原、第一次吉田内阁共三届内阁的外相，在占领外交政策特别是媾和及安保政策上，也相应表现出三个阶段特征。

东久迩内阁时期，吉田外相确立了对美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

该时期，美国、盟国、日本三者关系初步形成。其中，美日关系是主要方面：美国对日抑制为主、改造为辅的初期占领政策正式出台，它既是与盟国集团共同对日占领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华盛顿体制以来美国对日通过协调进行抑制政策在占领初期的延续；吉田外相则确立了即使美国制裁也要对美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显然，美国对日占领与日本对美协调，均出现二重性、矛盾性特征，双方一开始就形成了非对称的反比例对应关系。因此，尽管占领前夕吉田即已主张对美经济合作、通过合作尽快缩短制裁并实现媾和，但在美国对日抑制为主、改造为辅的初期占领政策之下，对美经济合作等外交思想几无实践余地，吉田外相对美国及其占领当局外交对应的重点，被迫纳入占领改革中去。

币原内阁时期；以首相币原、外相吉田为代表的战前稳健派，坚持对美英协调主义传统路线，开始探索媾和及安保对策，尽管尚未形成政府决策，但对美英圈倾向性前提的确立，却为占领中期芦田外交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该时期，美国、盟国、日本三者关系最终确立。其中，美日关系仍是主要方面：美国及其占领当局于1945年10月正式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同时又于1946年1月明令禁止日本研究对外政策；吉田外相在对应美国开始推行的战后改革上，仍坚持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在经济恢复上，开始积极争取美国对日粮食援助，试图借此打开日本贸易及外交限制的双重束缚；在盟军进驻等问题上，初步表明日本亲美敌苏之立场，同时又置盟军司令禁令于不顾，着手研究对外政策特别是媾和及安保政策。

第一次吉田内阁时期，在倾向于美英圈的前提下，吉田首相兼外相确立了对盟国全面媾和及媾和后由盟国集团保障安全的政策。

该时期，在对应美国仍继续推行的战后改革上，吉田首相兼外相仍坚持服从为主、对抗为辅的协调主义思想；在战后重建及经济恢复上，积极争取美国对日粮食特别是重油等工业物资援助，试图借此促进重点生产方式的实施；在媾和及安保政策上，1946年5月底确立对盟国全面媾和及媾和后由盟国集团保障安全的政策。1947年2月上述政策虽发生部分变化，但在总体上仍在维持既定方针，终其内阁垮台仍未改变。因此，这种媾和及安保政策与总体上所奉行的对美协调主义外交思想发生矛盾。这种矛盾的外交政策，导致了美国对吉田外交的疑忌与否定。

第二章 占领后期的吉田外交

该时期吉田茂相继组成第二次、第三次内阁并兼任外相，在

占领外交政策特别是媾和及安保政策上，相应表现出两个阶段的特征。

占领中期，吉田因在野而被排斥出最高决策层。该时期，日本正值片山内阁及芦田内阁两届中道政权时期，日美外交对应上相继发生方向性转变：日本对美由协调转向结盟政策，美国对日由改造转向结盟政策。1948年10月7日，美国NSC 13/2号文件制订和日本芦田内阁辞职同天发生，成为占领期日美关系转折点的判定标准，自此转入占领后期，吉田保守势力与美国再次走到一起。

第二次吉田内阁时期，继承了占领中期芦田外交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与总体上所奉行的对美协调主义外交思想最终归于一致。这种一致性导致了美国对吉田外交的重新肯定。

第三次吉田内阁时期，继续奉行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这种政策，与该时期美国确立以对日结盟为基点的亚太安保政策相吻合，日美媾和与结盟外交并行发展，以片面和约及日美安保条约为标志的旧金山体制最终确立。

第三章 占领结束后的吉田外交

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生效后的第三、四、五次吉田内阁时期，外交思想体系上与占领期相比已无根本性创新和发展，只是具体落实旧金山体制而已。

终章 吉田茂外交思想的影响

战后吉田茂外交思想，继承并发展了近代日本对英美协调主义的传统思想，通过对美英协调乃至对美结盟关系，进行媾和外交，对亚洲赔偿外交，谋求“亚洲盟主”地位，重建现代日本国家。而这种外交路线一直影响至今，对21世纪日本外交走向亦将继续发挥指导乃至主导作用。

本章从吉田在野、退职以及时至今日的影响出发，论证了以

下两个主要内容:

其一, 吉田对美结盟为基轴的国际协调主义思想为历届内阁继承和发展。

从战后日本四代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渊源上看, 与吉田同属战后第一代领导者的鸠山、石桥、岸信介三届内阁时期, 吉田茂反对鸠山内阁恢复日苏邦交, 反对石桥内阁恢复日中邦交及“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 支持鸠山内阁外相重光葵、石桥内阁外相岸信介以及岸内阁发展对美结盟的“双边”安保思想。重光外交、岸外交两次向美国表示修改并发展对美结盟范围, 最终由岸外交予以实现, 日美同盟开始摆脱占领期后遗症等的局限。“吉田学校”的嫡系弟子池田、佐藤、田中、大平, 属于战后第二、三代国家领导人, 仍然继承并发展对美结盟路线。桥本、小渊、森内阁时期, 已属于第四代领导者, 不仅仍然维护对美结盟为基轴的国际协调主义思想, 而且再次修改并发展了对美结盟路线, 日美同盟进一步摆脱冷战时期后遗症等之局限, 并由此走向成熟与完善阶段。

其二, 吉田的“亚洲盟主”思想一直影响着其后历届内阁的外交决策。

该思想是吉田退职后致池田首相信中最早表露出来的。这既与他战前的“日本帝国东亚支柱”论、占领期的“日本为亚洲自由国家先导”论一脉相承, 也与其对美结盟思想相关联, 即通过对美结盟实现对亚洲军事威胁、经济控制、政治主导目的。其间, “两个中国”论、对华双重外交, 便是其“亚洲盟主”思想的具体体现。日本1998年解密的外交档案中, 已有前首相池田向欧美提议“两个中国”的记载, 这也说明“两个中国”不是吉田的个人意志, 而成为日本外交领导层心照不宣的共识。1964年, 池田内阁推出“政经分离”政策促进和中国大陆经济交往, 同时, 派遣前首相吉田茂于同年2月携带池田亲笔信以特使身份

秘密赴台，表示支持反攻大陆，成为日本对两岸双重外交的开端。吉田巧妙运用“事实上的首相特使”和“私人立场”两种身份完成了使命。池田内阁虽然拉开了对华贸易序幕，但1964年4月和5月，吉田却又向台湾先后两次送交书简，前者再次确认与蒋会谈时达成一致的“反共、反两个中国”立场，后者许诺“年内日本不向中国大陆出口尼龙生产设施”。1951年，吉田预见中苏迟早分道扬镳，而希望维持对华关系，尽管遭到美国特使杜勒斯的反对，但四天后吉田就向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史迪威递交未署名书简，称“日本作为独立国家必须有独立的对华政策”，为日后对华双重外交埋下伏笔。日本2000年5月29日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包括吉田1956、1960、1962年访问欧美，佐藤荣作1967年访台等内容，再次暴露出40年前就对台海两岸推行双重外交的秘密。日本当时主张只有以“两个中国”方式才能确保台湾在联合国席位，认为若要维持台湾席位就不妨让中国大陆加入，不料两岸均不承认“两个中国”，最后只得以台湾退出、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收场。“两个中国”论虽告失败，但对华双重外交迄今仍在续演。

最后，本书提出了日本对美结盟远远走在冷战进程之前，即使没有美苏冷战也会有日美同盟的结论。这也关系到对21世纪日美同盟走向及日本外交思想走向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左右我们头脑的所谓“用冷战思维分析日美同盟”论是不准确的。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好像有了冷战，才有了日美同盟，仿佛冷战与日美同盟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日美同盟是近代日英同盟的翻版。日美结盟与冷战进程的互动关系表明，这种传统的冷战思维方式有其严重误区所在，它完全无视了日本近代以来外交传统所起到的客观促成作用，无法解释冷战结束之后日美同盟反而加强的新的现实。可以认为，与其说它说对了一半，不如说因误导了人们的视角而大错特错：它只是短视地看到日美

结盟是在冷战大背景下最终完成的，却没有看到在这个近背景之后更远一些的背景所在，这个远背景就是日本近代对英美协调乃至对英结盟的传统思想促动其战后对美结盟，而稍后即至的美苏冷战，只是给日本实现对美结盟提供了可乘之机而已。日美同盟是冷战的间接产物而非其直接产物，即使没有冷战现象，日本也要对美结盟，日美同盟也会在非冷战环境中通过另一种方式和程序得以形成，因为这是日本近代外交传统与战后外交实践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日本对美结盟既未落后于冷战进程，也未与冷战进程同步并行，而是恰恰相反，日本对美结盟无论从构想到成为政策再到实施这三个阶段，均走在美国对苏遏制、美苏冷战以及美国对日结盟进程之前，美国则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日本结盟要求：

第一，从日本要与美英结盟和美国对苏遏制构想的形成比较来看，日本要早于美国一天：日本最早对美英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构想是在1946年2月21日，由外务省条约局法规课的报告建议中作为备案提出的；美国对苏遏制构想则是在1946年2月22日，由驻苏代办乔治·凯南致国务院8000字长文电报中提出的。十余天后的3月5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方在美国富尔敦发表“铁幕演说”，打响了冷战第一枪。

第二，从日美双方结盟政策的制定比较来看，日本要早于美国一年零三个月：日本最早对美英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是在1947年7月21日，昭和天皇和外相芦田均一致认为，对美协调的同时对苏合作已不可能。26日及28日，外相芦田均先后向美国大使艾奇逊及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递交备忘录，提出了对美英为主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要求。28日当天，艾奇逊等便将该备忘录退回不予接受；1948年1月14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指令希波尔特对《芦田备忘录》及《天皇备忘录》均予拒绝。美国最早对日片面媾和及结盟政策则是在1948年10月7日，由国家安

全委员会 NSC 13/2 号文件正式通过，9 日方为杜鲁门总统批准生效。

第三，从日美双方结盟政策形成后的实施比较来看，日本要早于美国近三年：日本最早对美英片面媾和及对美结盟政策的实施是在 1947 年 7 月 26 日及 28 日，由片山内阁外相芦田均先后向美国大使艾奇逊及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递交备忘录的形式进行；美国对日结盟政策的实施则是在 1950 年 5 月 18 日，国务卿特别顾问约翰·杜勒斯受命负责对日媾和，6 月 22 日方与吉田茂首相会谈达成协议。总之，战后日美结盟及其不断续订的互动关系中，美国一直起到了决定性、制约性作用，日本则一直起到了主动性、促成性作用。

日美同盟虽缔结于冷战形成期，但这并不说明它从属于冷战演变过程并与其相始终。自 50 年代中期冷战趋向缓和时起，日美同盟便不断调整与修复，历经危机而依然维系。时至今日，经济国际化、集团化迅速发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亚洲经济圈、环太平洋经济圈等之构想相继提出，中国与东盟经济实力日增，日本对美经贸关系的依赖却进一步加深。日本无法排除美国的存在而单独主导亚太经济合作，不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继续维持对美协调、合作乃至结盟关系，最大限度地谋求在亚太地区及世界范围内的本国利益，这就是吉田外交之所以奠定战后日本发展方向的意义所在。如果我们从战后日美同盟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根源来看，是否可以认为，日美关系仍将在不断调整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日美同盟难以为继、日美战争不可避免等之结论尚属过早了呢？

世纪之交的今天，美日中三者关系处于新的转型时期，我们应充分警视日美同盟存在并延续的长期性、敌我性，充分警视即使美国放弃对日结盟日本也要极力争取的外交取向。日本虽然素以奉行对美结盟为外交指针，但与它对苏、中、俄等国的自主外